

佛教文化南来说与北来说 ——兼述青州与吴越地区佛教文化的关系——

林 玉海* 庄 明军**

仏教文化の南來說と北來說 ——青州と呉越仏教文化の關係を兼ねて——

Discussion of Origination of Buddhism : Exp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QINGZHOU and WUYUE Buddhism Culture

Yuhai LIN*, Mingjun ZHUANG**

仏教は古代インドから中国に伝わった。長い間、学者達は仏教伝来の時間と経路問題を廻って積極的に探索してきた。近年、我々はシルクロードと青州地区の仏教文化に対する研究を通して、その伝播過程及び青州と呉越両地における仏教文化の關係について新たな見解を得ることが出来た。ここでは、その一端を学会に公表し、忌憚のないご意見をいただきたい。

Buddhism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from ancient India. A lot of scholars have been discussing how and when Buddhism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for a long time. Recently, by the research of the Silk Route and Buddhism in QINGZHOU area, w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on how the Buddhism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QINGZHOU and WUYUE Buddhism culture. Hereby, we would press out our finding for your comments.

一、佛教传华的时间

佛教由古代印度传入中国，长久以来，对于传来的时间和传播的路线，有许多学者都在孜孜以求地探讨着。近几年来，我们通过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和青州地区的佛教的研究，将关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以及青州地区与吴越地区两地之间佛教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粗略的分析研究，现将这些不十分成熟和完善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与大家共同研究商讨，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有史料可以佐证的，佛教由西域传入汉地的时间，史学家认为是东汉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前后。在此之前，佛教是否已经传入中国？这个问题，目前已有证据表明，佛教或佛像在此之前已经通过某种形式传入了中国。

迄今在山东境内发现了多处有关佛教的文化遗迹，如沂南一号汉画像石墓中，在两处石柱顶部就

* 青島市文化遺產保護考古研究所所長
** 青州市博物館研究員

雕刻着佩戴头光的人物。该墓葬的年代是东汉末期。另外在青州东南约 90 公里处的安丘县博物馆里，一座汉代墓葬中，其汉画像石上也明显地刻画着有关佛教文化的图像，还有连云港的孔望山上，也雕刻着与佛教相关的摩崖岩画，这些都是比较早的佛教遗迹，其年代都应在公元之后。最近，在青州境内的稷山上，发现一座西汉晚期的石室墓，在墓口石壁上也雕刻着一些佛教文化的造像，其中有坐式佛像，也有莲梗等。对此有人虽提出怀疑，这些佛教文化的遗迹，大都因为在墓葬里，才得以保留下来。并且有刻铭文字的“□大夫”的字样，其侧还有手持笏板的人物，也有一组人物有背光，胁侍脚踏莲蓬的菩萨，其莲蓬、莲梗刻画明显，且其一侧有仕女，手持团扇。

首先可以肯定，在两晋之时，佛教已传入青州乃至山东大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在青州有一处寺院叫宁福寺，据清代益都县张承燮、李祖年先后主纂，后由法小山校补的《益都县图志》（光绪十七年始编，光绪三十三年成书）记载，该寺系建于晋太安元年（公元 302 年）。这处寺院遗址，今天尚能在其周边发现大量的瓦砾。当地老百姓把这处地片叫做“塔儿坡”，也就是说过去这里曾有佛塔高高耸立着。我们可以由此处沿着历史的脉络，追溯更加远古的异域文化。

2004 年，由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青州博物馆联合发掘了一处战国晚期的大墓，该墓葬简报发表在《2004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中¹⁾。从墓中出土了一件纯金制品和多件银器，其中纯金铸造的环首刀柄，还有二件列辨纹银豆盒都是由西域传来的艺术品，带有浓郁的西方文化艺术风格。纯金环首刀柄，明显地带有斯基泰文化的痕迹，而银豆盒，则带有西域粟特地区文化的影响²⁾。详细的研究文章见《“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在早于西汉的若干年，西域地区甚至发源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艺术品都能传播到青州地区。那么要说在西汉佛教由西域传播到山东，传播到青州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在战国至汉代，青州地区是丝绸的主要生产区域，笔者在《古青州，是丝绸之路的源头》一文中早已阐述的比较清楚。那么，伴随着张骞等人开凿打通西域的通道，佛教和佛教文化传入内地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种传播形式，也可以不是国家所拥有的，是以私人携带的方式和信仰者私自的形式，在民间传播开来的。所以，青州地区附近，在安丘、沂南、稷山等地的墓葬里，发现了佛教文化的遗物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在南方、在吴越地区有没有早于东汉的佛教文化，我们也发现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线索。在四川的乐山麻浩汉崖墓门楣的坐佛，发现了东汉早期佛教文化的遗物。在广州南越王墓中，也发现了西域的银质列辨纹银豆盒，还发现了人工加工染色的玉髓珠管等，这些都是西汉早期由西域传播而来的。《汉唐佛寺文化史》指出：我国现今所见的创作年代最早的一些佛像，如沂南东汉画像石上的两身立佛像、麻浩与柿子湾的东汉坐佛像、彭山陶摇钱树陶座上的东汉一佛二菩萨像等等，佛的面相轮廓，坐立样姿式，衣饰形制以至左右胁侍的构图，都已粗具后来传袭了千年的模式的雏形³⁾。这可以证明，‘佛陀为神’的观念在东汉已流行于东鲁至巴蜀的广大地域。但是早期佛陀的形象，大致还是概念化的，甚至是朦胧的。近年江南各地出土东吴、西晋时期的铜铸件、陶魂瓶，一些瓶壁上塑有人像，结跏趺坐，禅定印，有的还有头光，眉间有白毫相，可以认为是佛陀。但佛的面相都还相当模糊，也带有概念化、程式化的特点。如果要追溯佛像传入中国的开端，那就是汉武帝北击匈奴时，俘获的“金人神像”，这应该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件来华的佛陀像。既然匈奴人已开始信仰佛陀，那么与之争战和亲的西汉王朝，对此就不可能没有耳闻目睹。可能在当时朝廷之中的官吏还没有信奉的，但不应排除民间富贾士族中有流传信奉的。因为毕竟丝绸之路的开通，贸易的昌盛，直道的通达，都为佛教的东渐带来了可以选择的契机。也就是说，在东汉明帝夜梦神人金像之前，佛陀在民间，在某一地域，如东鲁、吴越和四川等地区，已有部分人群，早已开始信奉佛教，若没有前期近半个世纪的信仰，就不会改变根深蒂固的汉文化拥有的传统观念，就不会在墓葬中

出现佛教文化遗迹和瓷瓶贴塑上的佛教造像。所以说，民间的信仰应该远远早于由政府来颁布的信仰。如此推理尚可以成立的话，佛教传播路线，就是我们下面要揭示的问题。

二、佛教东渐的线路考略

青州地区与吴越地区，都是中国东部沿海都会商贸发达地区，这两个地区发现早期的佛教遗迹遗存是绝非偶然的。其传播的过程与线路，是首先决定这两个地区早期佛教的主要因素。这一南一北两地都可以说是东汉时期中国的最东部。一个是在长江下游的入海口地区，一个是在黄河下游的入海口处，因为长江与黄河的关系，决定了这二处天然独特的地理位置。我们以为丝绸之路开通前后，中国内陆的水运一直占据着商业贸易的主流。同样因为商业贸易活动带动了文化宗教的传播和交流。所以，从黄河以西河西走廊开始，就将佛教文化不断地沿着黄河两岸向东传播，直到青州广大地域；而长江自四川成都地区开始传播的佛教文化，也是沿着长江，不断向东传播渐至吴越地区。

1. 日本学者山名伸生认为，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是通过吐谷浑与西域各国作为渠道传来的，这其中不但直接作用于僧人，也是由于外国的使节，往返商贸的商人，由于这部分人群的传播和携带，致使成都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直接吸取了印度式样和西域式样，从而产生了成都地区独特的样式⁴⁾。那么这条线路就会是，由西域吐谷浑到成都，再顺长江而下到达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这一条通道已经被日本等国的专家所公认。还有一部分专家则认为，还有另外一条渠道，那就是，由印度直接乘商贸队的船只，经南海到广州，再沿海岸北上至吴越地区。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乃至广州地区，就发现了不少带有印度和西域地区的文化艺术的文物。那么经过西汉二百年的发展，至迟到东汉时期在广州乃至吴越传播发展出现佛教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据《南史》卷53“武陵王萧纪传”载：“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画者张僧繇至蜀，图其状。”这就说明，当时梁武帝派张僧繇去蜀国四川之成都摹画绘制武陵王的肖像。他在蜀国逗留期间，当然会去成都的寺院中观摩寺内的壁画和佛教。如此成都地区的佛像和佛画就会直接传播到建康及吴越地区。可以想象的出，当时或更早些，佛教中的绘画材料，是以毡和丝绸、绢为主，存世极难，不易保存，所以即便是从各种渠道传播到吴越地区，也过不了几百年就会面目全非了。直到出现了石质造像，才将许多佛教文化中的艺术特点，衣纹特征永久地保存下来了。

还有几则旁证的材料，可佐证这条自四川成都通往吴越的水路，既是经济商贸线路，也是艺术宗教传播的线路。梁武帝任命的历任益州刺史都是热心信奉佛教的官吏。在蜀地有与当地官吏萧儋，萧恢过从甚密的僧人如道仙、明达等，他们都是康国（撒马尔罕）出身的西域僧人。在第三任蜀国官吏萧儋时代，明达曾在四川的三台县造九层佛塔。后来河南王（吐谷浑）也于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在成都建造九层佛塔。另据《续高僧传》中说，道仙在未出家之前，就是利用长江的水运，往来于吴越蜀地之间而获得巨万财富的富商，最终成为富贾一方的大富。另外，由云南，缅甸通广州的线路，由古人开辟之后，到武陵王时期，也长期进行着商贸活动。据《梁书》卷55“萧纪传”载：武陵王擅长武略，他新开辟了一条南通建宁越隽的交通路线，可直达云南和缅甸，可作为南方的贸易渠道，远及印度。并且，也西通资陵、吐谷浑，通过振兴发展蚕业，使丝绸产品借蜀地之便利，远销西域。我们可以通过南朝时期的商贸通道和线路，证明吴越地区早期佛教传播东来的可能性是毋庸置疑的。

2. 青州地区佛教传来的路线，目前也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沿着黄河传播来的。那么这条线路，

无需所言，其发端应该是西域、敦煌，沿河西走廊而来的，沿途的各大石窟寺院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青州地区关于最早的寺院，史书中也有记载：约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佛教中所说的阿育王时代，相传青州地区就有佛寺了。这虽然难以让人相信，但《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如下记载：“石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图画予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在道宣著录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也有类似的记述。佛教讲究三归五戒，无妄语，若记载传录无误，那么位于青州西约十二公里的临淄“古阿育王塔”，也是比较早的佛教文物。因为临淄城位于淄河西岸，是齐国的都城，自姜太公封齐之后，由营丘迁都于此而兴建，前后约500多年的历史，在《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中有如下记载：“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由此到西汉，临淄城虽然非国都而兴盛，但亦属远近闻名的大都会。若公元前两汉之际，佛教东传在此营塔弘法度人，更是近人情合理法的。又因临淄水北通小清河与黄河相继入海，所以，若佛教传播的先驱者，由敦煌启程或由洛阳登舟，沿洛水而入黄河，不几日便可弃舟登岸步入青齐之地。此地虽与青州隔河相望，佛教传播亦不可限量。因为在青州东约三十里就有一处始建于西晋时期的寺院，广为人知，当地百姓皆耳熟能详。据《益都县图志》记载，位于青州城东南约三十五里的郑母镇“宁福寺”，“在城东南四十二里郑墓店。（因汉代大司马郑玄墓在此，故谓郑墓，今易名为郑母）。明洪武年间建，弘治十八年重修。”有碑（寺内）见《金石碑略》云，“郑母店有宁福寺，旧矣。考诸府乘，实造于晋太安元年。旧址在店东，地名塔儿坡者。与状元王公曾之墓相迹。”王曾者，宋仁宗时为宰相，死后葬于此，若宁福寺创立于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那么，它与临淄之阿育王寺，亦不无承袭相继的佛教渊源。同为青齐之地，皆属黄河入海口的山左之城，承上启下的佛教传导亦不无可能。

另一方而，青州地区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属于军事之要冲扼南北控东西，又是东西南北来往之枢纽之地，西汉时期，曾在青州设刺史部，是全国十三个刺史部之一。后又有广县城，广县侯、临淄王、齐王等在其周边营国。广县侯大墓于2007年被偶尔发现，出土铜印一方及大批文物。铜印阴文为“召嘉之印”，可以证明其为广县侯召欧之五代孙。在广县城内有无寺院，今已不可考，但在广固城附近有寺院，已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之。广固城见《水经注》，西晋时曹窋筑广固城。在公元400-410年间，广固城被南燕国改建为国都，这与当时信奉佛教的慕容德有一段佛缘关系。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云：“沙门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访其所适。朗曰：‘敬览三策，潘尚书可谓兴邦之术矣。今岁初，长星起于奎娄，遂扫虚危。而虚危，齐之分野，除旧布新之象。宜先定旧鲁，巡抚琅琊，待秋风戒节，然后北转临齐，天之道也’。德大悦，遂攻克广固。四年，潜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为建平，设行庙于宫南，遣使奉册告成焉。”因为大家都知道，僧朗和尚是迦湿弥国高僧佛图澄（公元231—340年）的大弟子。在后赵时期，佛图澄就亲率弟子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建造寺院893处。后来僧朗与僧湛、僧意等僧人来到山东。于苻坚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移居泰山金舆谷，在当世为名僧，声闻遐迩。前秦皇帝苻坚，后秦皇帝姚兴，后燕王慕容垂，南燕王慕容德，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北魏拓跋珪等等国主都非常敬重他，并送物资和田园。慕容德对朗公和尚的礼遇在《高僧传》卷5《竺僧朗传》中有这样记载：“钦朗名行，假号齐东王，给以二县租税。朗让王而取租税，为兴福业。”在当时来青州地区传道弘法者，有许多是西域僧人，同样也有许多当地人出家为僧者，如《高僧传》：“支昙兰，青州人，蔬食乐禅，诵经三十万言，晋太元中……”此处所谓的太元中应该在广固城中，慕容德统治之前。虽然在青州城郊至今没有发现早于北魏时期的佛像，但各种现象都能证明的确有佛教在青州地区大力兴盛，除广建寺院外，有许多外来的佛像传

人，就是在僧朗公和尚移居泰山金舆谷期间，泰山以东整个山东半岛的版图应该隶属青州广固城南燕国的国主慕容德的掌控之下，东南西北各地的僧人和佛像已云集于此。据《续高僧传》卷25《僧意传》可知，在朗公和尚住过的精舍中，就有七个国家赠送的金铜佛像，即有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国像，岱京像，相国像，高丽像。这其中的“吴国像”，应该是指的吴越地区佛像的代表，而“高丽像”，若指高句丽则值得怀疑，因为当时佛教还没有传至朝鲜半岛。其他的如“胡国像、女国像、昆仑国像、相国像”，应该是指西域各国的佛像。如“昆仑国”是指今天的缅甸克伦邦一带，其佛像的制作风格类似于印度后来的马土罗系统。这是史料之中，第一次提及到青州地区有关于佛教造像传播来的途径。同样，由此我们还可证明，青州地区的佛像，其传播来的路线，不但有沿黄河来的西域路线，也有一条沿海岸而来的海路。我们认为吴越地区的“吴国像”和“昆仑国像”，还有暂命名的“高丽像”都是由海路传来的。因为这一史料比较真实。在东魏时期高僧灵裕（公元518-605年），还为这批佛像写过《像赞》。至唐代道宣也曾提及这批佛像，可见这批佛像至唐时犹存。那么至于青州地区佛教传播自海路上来，这一观点，并非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了佛教可能是从海路传入中国的观点，因当时没有有力的证据，几为学界所讥笑。现在看来，佛像自海路传入中国东部沿海诸岸，并非没有可能。只因当时，由外域携带来的佛像，大都为了海上运输轻便，或者是纸、绢粉本画，或者有少量小型铜佛像，经过近千年的流失都已不复可考了。在这一方面僧人释慧皎有这样一段论述：“昔优填初刻旃檀，波斯始铸金质，皆现写真容，工图妙相，故能流光动瑞，尔后百余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坏撤诸塔，分取舍利。还值风潮，颇有遗落，故今海族之中，时或遇者。……育王诸女，亦次发净心，并携石熔金，图写神状，至能浮江泛海，影化东川。……及蔡情、秦景自西域还至，始传画毡释迦。自兹厥后，形象塔庙，与时竞列，泊于大梁，遗光奥盛。”即此观点，结合近几十年，在中国东部沿海所发现的早期佛教文化遗迹和文物，可以说，外域佛教无论是旃檀像、金像、石像或毡画像，各种原古瑞像进入中国，大致可以分化出四条路线，既西域向东分为长江、黄河两水系为第一条，印度、缅甸、云南为第二条，南海入江南为第三条，东海入江北为第四条。下面还有许多相关的传说也可以作为旁证。

在瑞像东来的诸多传说中，东南沿海一线如长江入海口的扬州之建邺、丹阳；松江至东海的吴县，是来华瑞像弃舟登岸的两个重要的港口地区，也就是本文中所述的吴越地区。如三国时期孙皓时，“育王所造”用于“镇于江府”的金像得之于建邺后园；西晋建兴初，被视为发现的石雕迦叶“大觉垂应”像，传说足从松江海口“浮江而至”吴县沪渎口的；东晋成和中，传说中的“育王第四女造”的金像，出现于丹阳张侯桥，后经数年，此像的铜莲花座又被出海打鱼的人发现，捞起相配相宜；东晋时徐州吴寺所供奉的太子思维坐像，是从扬都一“溯江西上”的外域僧人请来的，东晋瓦官寺内的狮子国玉佛像，是该国派遣的沙门僧人，浮海而来到达扬州时献上的。还有更多的关于海岸瑞像来华的传说，在此从略。

三、南北二地佛教文化的相对差异

毋庸讳言，在中国目前遗留下来的佛教造像，除极少量的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石质造像则以北魏以后的多见。所以在北魏之前的造像，金铜、土木石纸等都极少见，很难来区分南北二地佛教造像上的差异。然而就佛教文化而言，由于两地所传播来的佛教，并不是从一个地区传来，其传播路线的迥异已经证明了这二地所存在的差异性，所以其佛教文化形式上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北魏之前，因

为所遗存的佛教遗迹文物较少，都难以研究和探讨。在此，我们沿北魏之后，结合南北朝之间对峙的历史，分析这一时期的差异性。

在北魏军队攻克青州地区之前，青州地区的佛教文化应该与南方的佛教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北魏政权占领青州之后，首先打击的就是“吴蛮户”。据《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载：皇兴三年春（公元469年），北魏大军“克东阳，擒沈文秀。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万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二百，铜五千斤，钱十五万。城内户八千六百，人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这里所指的“吴蛮户”，应该是刘宋时期南朝的官吏家属以及吴越地区的工匠和商贾。这部分人群虽然约占城里居户的三分之一，但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群，他们在青州城被攻克占领之前，所信奉的佛教，应该与南方的吴越地区的佛教相同，故其佛教造像的式样也应相同。北魏占据青州后，相继采取几种措施，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教化和统治。

首先采取了“平齐户”移民政策，就是在北魏攻克青州后，为巩固其政权，消除隐患，掳掠青州豪族约8000余户，迁徙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为“平齐户”。当时，居住在青州东阳城的民户几乎全部被迁走了。这些被迁走的“齐户”，其待遇也不尽相同，少数高官、将军被称之为“客”；其次多数地主士族，则被称之为“平齐民”，在平城设立了“平齐郡”，安置他们，其行动受到了限制。再次则是众多的兵士和平民，一律被赏赐给将军、百官做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一段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故事。首先一则记述的是北海刘氏。刘昶是刘邦皇族后裔，胶东王之后，视为望族，随慕容德渡河来到青州后，世居青州北海都昌（今昌乐）。刘昶的儿子刘奉伯，曾任北海太守，他的几位孙子因为北魏占领青州，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异。长孙刘休宾，“少好学，有文才”，任刘宋的兖州刺史，后归降慕容白曜，投靠北魏。刘昶的另一个孙子刘孝标，家住东阳城，在8岁时，东阳城被北魏攻克，其母子沦为“平齐户”，生活困苦，母亲只好做了尼姑，儿子被迫做了和尚。后来，刘孝标投奔南朝刘宋，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还有一位也是刘氏后孙，刘芳。他“才思深敏，特精于经义，博闻强记”。在被迫移迁的“平齐户”中，白天替人抄书，夜间则“诵经不寝”，后成为经学大师，得到魏孝文帝的器重，任命为中书令，后又出任青州刺史。其他士族大户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在历史上都有一席之地的人名，如世居东阳城的蒋少游，性机巧，能绘画，有文思的才子，被发配到云中郡成为“平齐户”中的“兵户”，生活无着落，只好靠写字卖画为生，与蒋少游相同处境的还有高聪。还有不少“平齐户”被赏给寺院作了“僧只户”，沦为“僧只户”的则以房氏和崔氏见多。如崔光、崔道固、崔亮等等。

青州这一地区的中上层人群，迁徙到平城地区，这就使得当时这一地区的佛教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接踵而来的则是北魏地区北方的佛教文化。因为青州地区中上层人群大多被编为“平齐户”，迁徙于外地，在青州地区的佛教信奉者顿减，几乎成为空白。所以当北魏政府统治管辖青州地区时，伴随着新来的中上层统治人群的信仰，一种新的佛教造像形式，开始在青州地区繁荣发展起来。从目前青州地区所存留的佛教造像看，有从北向南发展的趋势。年代比较早的是北魏时期的铜造像，发现出土的地区以博兴龙华寺遗址为主⁵⁾，计有：

- (1) “北魏太和二年（478）”落陵委造像。
- (2) “北魏太和二年（478）”王上造像。这两件铜造像均出土于博兴龙华寺遗址。
- (3) “北魏太和年间（476-490）造像”有发愿文：“……青州乐陵 / 郡阳信县 / 张道果谨 / 率邑义道 / 谷内外七十 / 八人等敬 / 造弥勒像 / 一躯上为 /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 / 后为七世父 / 母因缘眷 / 属普愿一 / 切众生 / 同斯福。”出土于博兴兰山，不知现存何处。

- (4) 另有道充造像发愿为文为：“大魏正光五年岁次甲辰八月己卯日丑，青州高阳郡新城县口寺主道充，率化口口道侣法义兄弟、姊妹一百人，敬造弥勒尊像一躯。”该造像出土于临淄的施福寺。
- (5) 北魏孝昌二年（526）“……青州齐郡临淄县人帅僧达 / 范伯孙帅”等人造像。
- (6) 北魏孝昌四年造像，发愿文为：“大魏孝昌四年 / 岁次口申 / 二月丁酉朔 / 三月王辰肯 / 州齐郡临淄 / 县鹿光熊等”人造像。
- (7) 北魏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像，是在青州龙兴寺窖藏中出土发现的，其发愿文为：“永安二年二月四日清信女韩小华 / 敬造弥勒像一躯为亡夫乐丑儿与亡媳佑兴回奴……后生生尊贵世世侍佛。”

由以上这几件造像上的题刻和出土地点看，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是由北向南发展来的。早期北魏时的佛教造像，可以说严格地恪守着造像传承上的规定和尺度。但到了后期，由于青州地区接受着来自多方面的佛教传播者的光顾，在佛教造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青州地区的龙兴寺窖藏的石灰石佛教造像为例。北魏时期的造像与河北、山东的博兴、广饶等地区的石质背屏式的碑式造像几乎一样，只有大小上的区别，其服饰、形制上几无大的变异。而到了东魏，青州地区的佛像，除去吸收了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更多的则是出现发展了青州地区独特的造像形式。那就是胁侍菩萨下边莲台底座二龙的出现，并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另一方面，在单体造像上，则更多地接受了由南方传播过来的造像模式。从东魏到北齐，青州地区单体的造像风格，则更多地采纳了南朝的许多造像上的艺术形式，如“秀骨清像”、“衣薄出水”、“身体曲转阿娜”等等。这些都来源于南朝地区的艺术影响，有人把这些变化归功于犍陀罗和秣陀罗（马土罗）艺术上的演变，我们始终不敢苟同。因为在目前吴越地区所发现的石质造像在南朝早期并不多，所以要想与北魏北朝时期青州地区的龙兴寺造像进行比较，目前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目前我们所研究的青州地区龙兴寺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看，它们既不同于北朝时期北方的造像形式，也不同于北魏晚期黄河西部石窟寺的造像形式。说它自成一派、自成一体，只能在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的造像碑上，得到了证实。但在单体造像上，应无发现其吸纳的源泉，所以，我们怀疑是吸纳了南方的许多造像风格，也就是说与吴越地区的佛教有些相关联的可能，其两地既有陆路相通达，又可以沿海路相联络。

四、日本高僧圆仁和尙“客串”青州与吴越

当时间的长河流逝到唐代，伴随着隋唐帝国大一统天下的形成，佛教发展异常顺猛。原因在于隋朝统一了中国之后，又很尊崇佛教，一直到唐武宗灭佛之前，佛教一直处于鼎盛阶段。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佛教的服饰造型几乎无有大的改变和差异，所以青州地区与吴越地区的佛教艺术应该有更多一致的地方。

由于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商业贸易的扩大和发展，极大地刺激并带动了东亚诸国的经济和文化。尤其是日本，曾先后十六次向中国派遣“遣唐使”。早期的七次遣唐使团，都是从青州的崂山一带登陆，后来由于山东半岛军阀节度使割据等原因，才被迫向南转移至吴越地区的渡口登陆。日本的圆仁和尙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在青州和吴越之地活动的情况，他往返两地数次，记载了沿途许多佛教文化和寺院的真实场景^⑥。

圆仁和尙在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七月二日（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到达“扬州海陵

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次日逢到卖芦人答云：“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廿五日寅时，……自海陵县去宜陵馆五十里余，去州六十五里。……未时到禅智桥东侧停留。桥北头有灵居寺。……自桥西行三里有扬州府。…‘廿八日，……雇小船向灵居寺。……开元寺僧全操等九个僧来。”“八月一日，大使到州衙见扬州府都督李相公”。后才请圆仁和尚“往台州国清寺寻师”。到十月十九日才知晓。“大唐大和二年（828年）以来，为诸州多有密与受戒，下符诸州，不许百姓剃发为僧，唯有五台山戒坛一处，洛阳终山琉璃坛一处，自此二处外皆悉禁断。”所以，圆仁和尚才决定前往五台山。十一月底时，又记述了“扬州有四十余寺，就中过海来鉴真和尚本住龙兴寺，影像现在（还在）：……每州有开元寺。龙兴寺，只是扬州龙兴寺耳。”当时在青州也有龙兴寺，只是该寺院是皇帝赐名的寺院，却不知扬州之龙兴寺是否为赐名。圆仁和尚一行数人，雇船沿中国的东部浅海岸向北进发，于开成四年四月十七日到达“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这所说的州是指登州，属青州管辖。五月三日，才到达乳山。六月七日才到达青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山里有寺，名赤山法花院，本张宝高初所建也。”八月“十六日，为惟正、惟晓始读《因明论疏》。青州都督府管内有四个州：莱州、登州、淄州、青州，并山东道。登州四县：牟平县、文登县、蓬莱县、黄县。蓬莱县在州下。今此山院是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内。”“九月大，一日已聊，问路往台山行李、州名里数：过八个州到五台山，计二千九百九十来里；从赤山村到文登县，百三十里到青州；从青州行一百八十里，到淄州；从淄州到齐州，一百八里；过齐州到郛州，三百里；从郛州行，过黄河到魏府，一百八十里；过魏府到镇州，五百来里；从镇州入山，行五日，约三百里，应到五台山。”这是圆仁和尚在登州了解到的去五台山的行程和路线。

开成五年三月二日才进入登州府城：“登州都督府城东（西）一里，南北一里，城西南界有开元寺，城东北有法照寺，东南有龙兴寺，更无别寺。”三月十八日，“……到青州北海县界，田庄卜家断中。”“廿一日，……到青州府龙兴寺宿。寺家具录来由报州。从登州五百四十里。”他在三月二十五日送给都督府的公函中写道：“右圆仁等归心圣迹，涉海访寻。欲往台山（五台山），经夏修进；后游诸方，寻师求法。……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副使张员外乞粮食。”在青州龙兴寺自三月二十日到四月三日，前后十四天，到四月三日早上离时，他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描述：“三日平明，发。幕府从初相见之时，心极殷勤，在寺之时，每日有恩族，殷问不继。发行之时，差人送路，兼示道路。……从寺里过州城，西北去城外十里有尧王庙。……出城向北，行廿里，到益都县界石羊村陈家食。主人心平。斋后西北行十五里，到临淄县界淄水驿。西行廿五里，到金岭驿东王家宿。主人心性直好，望西遥见长白山。”今在邹平长白山上仍存一处佛教胜迹——醴泉井。“六日……到（长白山）醴泉寺断中。斋后，巡礼寺院。礼拜志公和尚影（画像），在琉璃殿内安置。户柱阶砌，皆用碧石构作，宝幡奇彩，尽世珍奇，铺到殿里。志公和尚是十一面菩萨之化身……”至五月一日才到达五台山“……向西北望见中台，伏地礼拜，此即文殊师利境也。五顶之圆高，不见树木，状如覆铜盆，遥望之会，不觉流泪。树木开花不同别处，奇境特深，此即清凉山‘金色世界’文殊师利现在利化”。在五台山圆仁和一行逗留时间较长，近二月。从五台山，又辗转去了长安。到唐朝国都时呈上的公函是这样写的：“右圆仁等，去开成三年四月，随本国朝贡使，上船过海。到七月二日，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八月内到扬州，寄住开元寺，过一冬。开成四年二月，离扬州到楚州，寄住开元寺。至七月，到登州文登县赤山院。住过一冬，至今年二月，离登州。三月到青州，权住龙兴寺。十日以来，遂于节度使寿尚书边请得公函。五月一日，到五台山

巡礼圣礼。七月一日，从五台来。今月廿三日到城。今请权寄住城中寺舍，寻师听学，却归本国。”

圆仁和尚原打算与日本的惠芳和尚取明州归国。因惠芳和尚的“钱物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又人船已备。”时逢会昌三年“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军容衙院。”这时外域僧人也受到唐朝会昌灭佛运动的冲击。圆仁和尚等归心如箭，亦被勒令在中国僧人各自归回本国。圆仁和尚故向楚州行进。“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张大使从去冬造船，至今年二月功毕。转拟载圆仁等，发送归国。”但因其副使之诬告，张泳（张大使）又不敢专拒，乃从文登界过海归国之事不成矣。商量往明州。趁本国神御井等船归国。“缘目下无船往南，将十七端布雇新罗人郑客车，载衣物，傍海望密州界去。”三月出发，十七日，“到密州诸城县界大朱山驻马浦，遇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

十四日到海州界东海山田湾浦，廿四日，到淮水海住，六月五日，到楚州新罗坊。这时才得知明州的日本国的人船早已发走。九日得到一消息说：“五月一日，从苏州江口发往日本国。过廿一日，到莱州界崂山。诸人商量，日本国僧人等，今在登州赤山，便拟往彼相取。”“次遇人说：‘其僧等已往南州，乘本国舟船去，今且在崂山相待，事须回棹来。’”于是，圆仁和尚一行又调头到崂山南椒家庄。访金珍船，其船已往登州赤山浦。并有留书云：“专在赤山相待”。又从崂山去了乳山，廿八日“到田横岛”。七月廿日，到乳山长淮浦，见到了金珍等船。九月二日午时，从赤浦渡海，出赤山渡海从莫瑯口回国。圆仁和尚往返地青州及吴越地区多次，在他的《入唐巡法求礼记》中把沿途及两地的佛教寺院记述的比较清楚。但不知何因对青州的龙兴寺记述的简略。当时的龙兴寺应该规模宏大，建制宏伟。可能是由于地方官吏先忙于“球场”，而冷落了这帮异域来的僧人，而致使青州龙兴寺无更多的文字论载。

五、龙兴寺窖藏所出土的佛像应该就是青州地区佛教文化的缩影

在吴越地区还有更多的地方，在唐代都建有龙兴寺。龙兴寺这个名字，是由皇帝赐名，是因给各地寺院赐的寺名得来的。如今青州地区发现的龙兴寺造像饮誉海内外。对于它的历史，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以期与吴越地区的佛教文化有所比较。

1996年10月6日，在山东青州师范学校建设整平操场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这处巨大的宝藏——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上自北魏下至北宋时期的各类造像400余尊。这一发现是佛教考古史上所罕见的，改写了中国佛教美术史，被列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⁷⁾。

青州，自古就是佛教的兴盛之地，寺院文化十分厚实。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青州即建有宁福寺（今广福寺遗址）；慕容德建立南燕国，定都广固城，推崇佛教，著名高僧朗公也跟随而至，慕容德给他巨资，让他大兴佛事，建有多所寺院。

刘裕破南燕后，不久取代东晋，建立南朝刘宋，同时，流落南方的青齐士族纷纷返回，带来了南朝更为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

元代于钦在所著《齐乘》中对龙兴寺作过考证：“寺内有饭客鼓架，寺东为淘米涧。”相传，“饭客鼓架”为孟尝君招待食客的遗物；于钦错误地认定，龙兴寺为南朝萧齐青州刺史刘善明的旧宅。因刘善明家曾在此建立粥棚，赈济饥民。

刘善明，出身青齐豪族刘氏，曾任南朝萧齐的南青州刺史。父刘怀民曾任齐州、北海郡太守。世居青州，在南阳河畔辟建宅院。南朝刘宋元嘉末年（450年），青州发生饥荒，人相食，刘善明家有存粮，就设粥棚，开仓救济灾民，百姓称他家的田地为“续命田”。宅院内建有佛祖供奉场所，由于刘家的声誉，四周的善男信女都来拜佛，香火兴旺，人们称其宅院为“佛堂”。

到北魏、北齐时期，青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统治者称为“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南北文化在此交融。刘善明宅院的佛堂，不断扩大规模，遂成为寺院，因寺址在南阳河边，又因北齐后主高纬赐额“南阳”，故名南阳寺。

隋朝开皇年间，改名为长乐寺，又称道藏寺，“道藏”一名，也是隋代皇帝赐的寺名。唐朝武则天尊掌权，为对抗李氏势力，崇佛抑道，佛教大发展，长乐寺改名大云寺，因《大云经》被武则天崇拜而奉为大云寺，为全国八大寺院之一。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整顿佛教寺院，又改称为龙兴寺。“龙兴”二字，隐含唐朝李氏战胜武后势力，重新执掌政权的含义。

唐代龙兴寺占地大约近百亩，因最早为刘善明舍宅而建，所以它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庭院式布局方式。此后不断扩建，到北齐时，已是佛殿密集，宝塔耸立，多所跨院相拥而成。北齐武平四年所建《临淮王像碑》描述：

南阳寺者，乃正东之甲寺也。即左通闾闾，亦右凭涧谷，前望崛磐，却临淄洱。层图迈于涌塔，秘宇齐于化宫……遂于此所爱营佛寺，制无量寿像一区，高三丈九尺，并造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士而胁侍焉。

这段话的大意是：南阳寺是东方最大型的寺院，左通青州城闹市，右傍南阳河涧谷，南望耸立的山巅，远处是淄河和弥河，风光秀丽，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殿塔規制齐全，适合修行法事，因而十分兴盛。寺中有石雕佛像，佛像两边还有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佛像高三丈九尺，约合10米多，应该是当时最高的石雕像之一。

《临淮王像碑》是临淮王娄定远所立，置于龙兴寺内。娄定远，为北齐重臣，位至司空，别封临淮郡王，后出任青州刺史。该碑高4.4米，宽1.6米，碑文共1500多字。碑阴刻有“龙兴之寺”四个遒劲大字，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所写。李邕，著名书法家和文学家，于唐天宝年间任北海太守。为龙兴寺书写的匾额，因后遗失，金人又缘拓片，并篆刻在著名的《临淮王像碑》后侧。此碑今存于青州博物馆。

隋唐至北宋中期，龙兴寺一直香火袅袅、梵音缭绕，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到宋景祐四年（1037年）夏竦知青州，撰写的《青州龙兴寺重修中佛殿记》还这样描述：

地势陡绝，崛埽洋水之阴（阳水之南，河北日阳，河南日阴），楼观飞注，翱翔重之表；东践绝涧，径度于闾闾，西瞰群峰，旁属于原野；十二之胜尽于兹焉。

这段描写与《临淮王像碑》的描述基本相同，但表达的更有文采，更加气势。

龙兴寺的布局，从史料记载看，一直保持院落式的结构，有前、中、后佛殿，还有天宫院、百法院、新罗院、九曜院等众多院落。元代于钦《齐乘》记载：龙兴寺的“天宫院，古老柏院也”，院内有石刻，雕刻着布衣诗人张在的诗：

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去又回，惟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

张在，青州人，《宋诗纪事》说他“少能文，奇蹇不遇，老死场屋”，虽能诗文，却仕途郁郁不得志，布衣终生。这首《题名龙兴寺老柏院》诗，流传甚广。由此也知，唐宋时期，龙兴寺松柏森森，牡丹艳艳，确为游乐抒怀之胜景。

自唐朝末期武宗灭佛，历经宋、金、元三朝，龙兴寺开始衰退，但仍是天下名刹。明朝初年，朱元璋封自己的儿子为齐王，拓地建齐王府，延续了近千年的龙兴寺遂湮没，人们对龙兴寺的记忆也开始淡漠。但龙兴寺窖藏佛像的发现，又激发了各界人士对龙兴寺的极大兴趣。

龙兴寺出土的佛教造像达 400 余尊，具有明确的年代刻铭者，有北魏永安二年（529 年）与北宋天圣四年（1026 年）的作品，时间跨度 500 余年，而以东魏、北齐时代的为主⁸⁾。佛像的材质，有石、陶、铁、泥等多种材质，而以石灰石石雕为主。其数量之大，跨代之久，种类之全，雕刻之精，贴金彩绘保存之完好，在我国佛教考古中实属罕见，被学术界称为“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

龙兴寺窖藏佛像神态逼真，形态各异，或深思，或凝神，或禅定，或说法，佛教哲学的全部思想和智慧，通过这些精美的佛像都展现了出来。特别是施以贴金彩绘之后，更显得神圣端庄、华丽高雅，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造像，从种类上分，主要有背屏式佛三尊像、单体佛造像、菩萨造像等。

北魏时期的佛造像以三尊背屏式为主，其特征是面部表现细腻，神态刻画生动，衣着厚重，垂线较多，而菩萨造像则衣着简单，饰件较少，造型简洁明快。东魏时期的风格，尤其显露出鲜明的青州地方特色：佛造像基座均由二龙吐水柱衬托荷叶、荷花、荷蕾组成。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最多，以单体圆雕造像为主，体态丰满，造型准确，其中的佛造像，造型极为简练，衣饰几乎都是上着内衣，外披袈裟，下穿长裙，袈裟不彩绘，而垂线较少。

与佛造像的简洁相反，菩萨造像却雕刻极繁：都头戴各式高冠，两侧有冠带，发饰变化多端，颈佩各种项圈，肩披飘逸的帛，饰有串串用玉胜、珊瑚、圆珠连接的环珞。

造像作品中，有一件被称为“东方断臂维纳斯”的彩绘菩萨像，尤具魅力，最有观赏价值。这尊菩萨通高 136 厘米，头戴透雕花冠，黑发在前额梳成圆圈状，并有两束束发后垂，自肩部到时间。雕像面部清秀，神态安详，高鼻挺直，唇线清晰，大眼下视，似有所思；脖颈细长，佩带连珠状项圈，内着对襟僧祇衣，外穿有团花图案的披帛和长裙，跣足立于台座上。精美的环珞、裙带富丽堂皇，又不显繁缛。全像沉静的表情与端立的姿态十分协调，流露出安谧慈肃的气息韵律，残缺的右手也令人遐想联翩，确实达到高妙的境界。

出土的窖藏佛像，因其造像风格特殊，被考古界专家定为中土大地上“以青州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佛教区域文化”，而成为全国的第六个佛教区域文化；日本学者在研究以后，认为日本、韩国的佛教文化与龙兴寺一致，又定为“环黄海佛教区域文化”，承认山东的佛教文化向东传播，青州成为无可替代的跳板。龙兴寺佛像精品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以及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瑞士等地展出，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出土的造像，大多破损严重，但又是郑重有序地埋藏在窖内，且还有祭奠的痕迹。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什么人埋藏了这些造像？对此，众说纷纭。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测：龙兴寺兴盛时期，虔诚的善男信女施舍资财雕刻了许多精美的造像，同样虔诚的寺院僧侣把这些历代和当代的精美的造像精心收集和供奉。但佛教几经劫难，多次灭佛运动，尤其是唐武宗的灭佛，使这些佛像遭受破损。再后来，因为道教的兴起，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原因，龙兴寺彻底破坏，精美的造像狼籍满地。于是，一群始终虔诚的僧侣们，偷偷地、悄悄地把这些佛像收集起来，深深地埋葬在龙兴寺别院竹修林茂之处，期待着有朝一日寺院再建，佛像重见天日。

而今，延续千年之久的窖藏佛像盛世重光，得以展现佛教文化的奇异风采。

注释

- 1) 中国国家文物局编《2004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 年。
- 2) 张柱华编《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第 17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年）。
- 3) 张弓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 4) 山名伸生著《吐谷渾と成都の仏像》，每日出版社编《仏教芸術》，第 218 卷，1995 年。
- 5) 李少南《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6 年 9 期。
- 6) [日] 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7) 夏名采、杨华胜、刘华国著《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 年 2 期。
- 8) 山东青州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编《盛世重光—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1999 年。